

浙江省

浙江省地方志述評

浙江地處東海之濱，唐宋以來，已成我國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的地區之一，素有“文化薈萃，著述斐然”之邦的譽稱；在編纂方志的歷史長河中，浙江又占有光輝的一頁。

簡言之，從唐宋至民國時期，浙江各地修志之數量與質量總是名列前茅的。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所列浙江各地方志總數為六百四十一種，約占全國總數的十三分之一強。

地區名稱	總數(種)	府志	縣志	鄉鎮志	備考
省志	11				
杭州市	102	19	79	4	
寧波市	114	12	94	8	
溫州市	39	8	30	1	
嘉興地區	154	23	80	51	今已分置嘉興市、湖州市
舟山地區	6	2	4		
紹興地區	55	10	36	9	
臺州地區	31	8	23		
金華地區	76	8	68		今已分置金華市、衢州市
麗水地區	53	7	45	1	
總計	641	97	459	74	

從上述簡表統計數得知，浙江省方志分佈一些特點：

①省轄市杭州、寧波、溫州三市經濟發達，地區方志占浙省總數約40%左右。

②嘉興地區鄉鎮志為全省之冠，多達五十一種，占全省總數70%。鄉鎮志幾乎都是明清時所編撰。

③縣志以寧波市、嘉興地區、杭州市為最多的地市。

④省志十一種，府志總數為九十七種，縣志總數為四百五十九種，鄉鎮志為七十四種，我省方志以縣志為大多數，約占四分之三。

浙江方志的發展歷史也具有自己的特點。浙江地方志始於何時？許多學者的看法是把《越絕書》（東漢袁康、吳平編撰）當作浙江乃至全國的第一部方志。清人洪亮吉說：“一方之志，始於越絕。”^①近世多數學者亦宗尚洪說，認為此書是“國內現存最古的地方志”。我們則持不同看法。

《越絕書》並非方志，把它歸入地方史之林更妥。理由有三，其一，《越絕書》現存十五卷，全書與《吳越春秋》相出入，主要記述吳越爭霸的歷史，尤着重於伍員、范蠡、文種、計倪等人的活動。全書以子胥去國而楚亡、夫差報仇而吳興、勾踐嘗膽而滅吳三事為經。撰述以史為主，偶及吳、越部分地區的地理沿革，不同於史、地並重的地方志。其二，作者多採異聞傳說，於道、術、魂魄、陰陽等虛妄之事津津樂道，追叙重要史實或考

① 洪亮吉《新修澄城縣志》序。

核輿地方則甚為粗疏，故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其“雖本史實，並含異聞”，是介乎歷史與小說之間的載籍。其三，《越絕書》體例頗雜，釋名者似字書，載言者類語錄，志怪者近小說，迥異後世方志之門類清晰、義例劃一。《隋書·經籍志》將它列為“雜史”，《宋史·藝文志》將它列為“霸史”，《四庫全書》均列入“史部·載記類”；由此可見，以地方史目之，應該說是有道理的。

《越絕書》產生於東漢，有其客現歷史原因。春秋戰國時期，浙江政治嬗變多端，經濟發展緩慢，自難與中原諸國的先進文化相比肩。秦統一中國後，浙江政局漸趨穩定。歷經兩漢，戰禍不及，生產上升，文化逐漸繁昌。同時，東漢光武帝劉秀為表彰鄉里之盛，詔撰《南陽風俗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隋書·經籍志》），包括《越絕書》在內的各種著述便應運而生。

自三國以迄南北朝，中原連歲征戰，兵燹不息，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在地方割據局面下，浙江偏居江南一隅，相對穩定，經濟發展尤得天獨厚。加之，東吳、東晉和南朝四代，政治中心相繼置於江南，統治者迫切需要了解江南各地的風俗、人物、田賦、戶丁、山川、關隘等基本情況，以供政治、經濟及軍事決策之用。為適應這種需要，以反映某一地區地理概況（包括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為主的“地志”便大批問世了，至此，浙江方始出現“雛型”狀態的地方志。

這種“雛型”的浙江地方志，擇其要者，有如下列：

《分吳、會、丹陽三郡記》三卷。清《〔雍正〕浙江通志》列此記為“兩浙志乘”之首，似可看作我省第一部地志。此記書名首見於《舊唐書·經籍志》，然不著撰人。原書佚亡，《太平御覽》尚輯存若干佚文，如人事部：“土城者，勾踐時得西施、鄭旦，作土城貯之”；兵部：“卞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禮儀部：“種山，大夫種所葬也”。從這

些零星載述揣想，本書記述內容大致為東漢以後三郡的地理概況。

《會稽郡故書雜集》（載《魯迅全集》第十卷），是魯迅早期輯錄的古代逸書集。計收謝承《會稽後賢傳》、虞預《會稽典錄》、鍾離岫《會稽後賢傳記》、賀氏《會稽先賢象贊》、朱育《會稽土地記》、賀循《會稽記》、孔靈符《會稽記》和夏侯曾先《會稽地記》八種。所錄逸文，大抵輯自唐宋類書及其他古籍，並經校勘補益。前四種記古代會稽的人物事迹，後四種載古代會稽的山川地理、名勝傳說。魯迅《序》稱：“書中賢俊之名，言行之迹，風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遺，捨此更不可見”，學術價值甚高。侯康《補三國藝文志》稱譽《會稽先賢傳》云：“《御覽》屢引之。所記諸人事，多史傳之佚文。嚴遵二條，足補《後漢書》本傳之闕。陳業二條，足以證《吳志·虞翻傳》注。吉光片羽，皆可寶也。”又如朱育《會稽土地記》，所言皆涉地理，是最古的一部會稽地志。魯迅輯本一卷，僅錄記載山陰、長山的佚文各一則；而兩則均被《世說新語·言語篇》注所稱引，其中一則復被嘉泰《會稽志》引用。

《錢唐記》，南朝劉宋劉道真撰。此書專記古代杭州的地理概況。《後漢書》注、《水經注》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都曾多處引用過它^①。可惜的是，《錢唐記》早已逸失，我們今天已無從窺見全豹了。

《吳興記》，南朝劉宋山謙之撰。原三卷，現存一卷本乃清人繆荃孫所輯。此書專記古吳興郡之地理。它的內容曾被《後漢書》注、《世說新語》注及《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寰宇記》等稱引過。殘存的一卷本，仍是我們研究地理沿革情況的重要參考資料。

《永嘉郡記》一卷，南朝劉宋鄭緝之撰。清人孫貽讓耗巨大精力，從類書和其他史志

^① 參見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

中爬梳拾掇，集腋成裘，方為後人留下現在所見的這個輯佚本。《永嘉郡記》記述了大量的古代永嘉地理概況和民間傳說，編纂温州地方志時很有參考價值。

魏晉南北朝的地志，留傳至今者屈指可數。我們今天只能略窺鱗爪。雖然如此，撰於此一時期的浙江地志，仍有若干特點值得注意：①載述內容曾被歷代史籍和類書所廣泛稱引，史料價值較高。因此，傳世者固無完本，但吉光片羽，彌足珍貴。②我省地志的輯佚本，至今尚有十餘種之多。就全國而言，已屬名列前茅。③從體裁形式着眼，則它們或記地理，或叙風俗，或傳人物，或述事迹，大多內容單一，文字簡略，體例也不嚴謹，自然不能與後來方志的規模相提並論，不過是地方志的雛形而已。

隋、唐之際，國家重新統一，經濟、文化都獲得一定發展，原來破壞較少的江南尤其繁榮富庶。自隋煬帝“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於尚書”^①以來，隋、唐兩代全國性的區域志不斷面世。傳世的《元和郡縣圖志》，集漢、唐地理志之大成，開後世一統志的端緒，為歷代學者所重。其中關於浙東觀察使所領之越、婺、衢、處、溫、臺、明七州三十八縣的載述^②，是後來纂修浙江方志者經常查閱的重要史料。

這個時期，由於中央詔令地方修志（中唐以後，還規定各州郡編選圖經送交職方），由是“圖經”形式的地方志極為發達。惜乎僅因當時需要而纂，隨用隨編，用完即了，不甚注意保存，以後復遭五代之亂，幸存者如鳳毛麟角。據目前所知，與我省有關的唯唐人陸廣微的《吳地記》一種，經“後人採掇成編，又竄入他說以足卷帙”^③輯為一卷，採入《四庫全書》。此書立足吳郡（今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區，當時屬於吳郡），雜記史地，相當接近於宋以後的方志。說明隋唐時期以“圖經”為主的地方志，已脫離初級階段，開始趨向定型。宋朝是我國方志史上繼往開來

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方志數量激增，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統計，兩宋方志近六百種，大大超過漢唐方志的總和，幾於“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記錄焉”^④。另一方面，方志體例漸備，為後來方志的發展創制了規模，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小序所說：自宋代編纂的《太平寰宇記》出，“於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元、明以後，體例相沿”。

北宋時，北疆外患頻仍，江南遠離邊陲，全國經濟中心逐漸南移。東南數省（包括浙江）已成朝廷財政、物資的主要取給地，所謂“國家根本，仰給東南”^⑤。特別是宋室南遷，定都臨安，浙江一躍而成京畿重地，促使經濟與文化比翼雙飛。至於元朝代宋，由於異族入主，民族傳統不同，地方志的修纂是承續南宋餘緒的。

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宋元時期（其中又以南宋為主），浙江的地方志突飛猛進地發展，具有三點鮮明的特色：其一，宋元方志流傳至今者不過三十餘種，浙江一省竟占三分之一以上。其二，隋唐時期纂修的圖經，目的僅僅為了向中央呈報，大抵詳於地理，略於人文，或專記某一方面，體例不甚詳備；南宋以降，大批涌現的州郡志，內容包羅萬象，記載“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⑥而州郡志中之佼佼者，則多數係浙江方志，其三，比較注重資料的考證和校訂，方志的學術價值空前提高。可以這樣斷定：浙江地方志的定型，即在此一時期。

宋元時期的方志，首薦《嚴州圖經》。嚴州故治，位於今杭州市建德縣境，原書八卷，今存三卷。《四庫全書》未收，且稱其已佚，

① 《隋書》卷33，《經籍》二。

② 參見《元和郡縣圖志》卷26，《江南道》。

③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七十史部地理類“吳地記”條。

④ 引見《中國古方志論》第438頁。

⑤ 《宋史》337卷《顯祖禹傳》。

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684史部地理類“太平寰宇記”條。

想當時未之見也。是志爲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所修，是迄今可見的宋代最古圖經；至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知州陳公亮以原版本不存，命州學教授劉文富訂正重刻，刊本今存南京圖書館。是志又名《新定志》，故南宋《輿地紀勝》、《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俱著錄《新定志》篇目，“圖經”之名遂湮。此一事實，具體反映了圖經逐步嬗變爲地方志的過程。故《嚴州圖經》素爲歷代方志學家注目。此外，此書首卷載郡志，以下諸卷分別爲所屬縣志。各縣皆自列門類，按沿革、分野、風俗、戶口、學校、軍營、坊市、物產、土貢、人物等項分別載述，不與郡志相混。這種編撰義例，與後此的《〔寶慶〕四明志》等如出一轍，可供我們尋繹縣志單獨成書的緣由。至於具列自晉迄宋的戶口數字，能補史書不載之闕；對羅城周長的考訂，可糾前人記述失實之訛等等，則其在學術研究上的作用是毋待贅言的。

再者，宋人高似孫纂修的《剡錄》同樣值得一談。嵊縣於漢代爲剡縣，《剡錄》即嵊縣志。是志共十卷。編次有序，條理秩然，行文簡約古雅，引證賅博精審。它的編纂義例，常被後人所仿效：“其先賢傳，每事必注其所據之書，可爲《地志》紀人物之法。其山水記，仿酈道元《水經注》例，脈絡井然而風景如睹，亦可爲《地志》紀山水之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草木禽魚誌”，詳考各種物產，兼及有關傳說，信而有徵，舒卷自如。卷六“書、文”門，著錄阮裕、王羲之、謝靈運等十四人的著述和阮、王、謝三氏家譜之名目共四十二種，各列卷數，又開創方志記載地方著述書目之先例。《剡錄》問世之初已飲譽文壇，歷久彌新，成爲我省一部著名的地方志。

南宋“臨安三志”足供後世修方志者借鑒。《〔乾道〕臨安志》，原書十五卷，迨明已佚，今存殘本三卷。此書敘述簡賅，詳略得宜。所載內容，常爲後起的《淳祐志》和

《咸淳志》所本，是現存最早的一部杭州地方志。尤其它的第三卷臚列了自三國以迄乾道初年的歷朝歷任臨安牧守的姓氏里貫，並一一就其生平和宦迹作了簡括的介紹，這對研究南宋以前的杭州歷史頗有價值，《〔淳祐〕臨安志》，今存殘本六卷，是清朝嘉慶年間發現的。此書宋刊本早佚。原書卷數無從考知。紀述簡雅，徵引賅洽，對杭州城市的變遷與沿革敘述甚備。係探索南宋以前杭州城市發展情況的重要史料。書中還大量引用杭州最早的《祥符圖經》（早已散佚），爲研究宋代方志修纂史提供了綫索。《〔咸淳〕臨安志》，原書百卷，今存九十五卷。是志敘述詳贍，體例井然。採錄內容較前此二志增益甚多；復對前志材料“徵考詳核”，力求準確可靠。卷首所刊的《宮城圖》、《京城圖》、《浙江圖》、《西湖圖》，乃現存的南宋都城最古地圖。這些文字和輿圖，既補充了《宋史》記載都城的粗疏，又爲明人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和清人傅王露《西湖志》、翟灝《湖山便覽》等介紹西湖風景諸書提供了翔實的資料。爲此，朱彝尊、杭世駿等推崇它是浙江地方志中的“上駟”。

還有必要提一下常棠纂修的《澈水志》。志成於宋理宗紹定三年（1230），共八卷，分地理、山水、廡舍、坊巷、古迹、物產、碑記、詩咏等十五門。書名《澈水志》，取“澈水者，蓋《水經》所載谷水流出爲澈浦者是也，”^①實係澈浦鎮志，非如晚近某些方志論文所謂的“山水志”。《〔紹定〕澈水志》，乃傳世鄉鎮志中最古的一部，研究郡縣志、鄉鎮志者似不可不讀。

此外，宋、元時期今寧波的“四明六志”（即《〔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續志》、《〔延祐〕四明志》、《〔大德〕昌國州志》、《〔至正〕四明志》和今紹興地區的《〔嘉泰〕會稽志》、

① 《〔紹定〕海鹽澈水志》卷上，羅叔韶序。

今臺州地區的《〔嘉定〕赤誠志》、今嘉興地區的《〔至元〕嘉禾志》等，也都是宋元時期傳世的浙江名志。

明、清兩代，中國基本處於大一統的局面，尤其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在江南產生。加之，朱明王朝積極倡導“治天下者以史為鑒，治郡國者以志為鑒”^①，各級政府十分重視修纂方志。各地方志一修再修，蔚為風氣。清朝代明，經濟、文化繼續繁榮。清政府把地方志當做“昭同軌、同文、同倫之盛”的得力工具，三令五申，詔“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通志”^②。以後，更嚴令各省、府、州、縣每隔六十年必須修志一次。乾嘉之際，三次修纂一統志，形成舉國修志的高潮，各地相繼設立修志局，使編纂方志幾乎成爲一項制度化的經常性工作。清代所修方志，無論卷數、品類或質量，均達到空前的規模，是我國方志編纂史上的鼎盛時期。

浙江於此時期，方志的修纂亦稱全盛，所纂修府縣志多達四五百種，約占浙江方志總數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之間，幾乎每年能刊印一本。同時浙江方志體例亦臻完備。具體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宋、元以州郡志為主；明代以後，浙江才出現全省性的通志、縣志和鄉鎮志，並且自省至鎮幾乎處處有志。方志的大小品類，到明、清業已完備，後世修志的地域範圍再難突破。其次，所修之志比較注意經濟史料的搜集。現存各府志和部分縣、鎮志中，收集了相當豐富的有關資本主義萌芽的材料，說明我省明清方志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又提高了一步，開始接近近代方志的編纂原則。復次，文筆或疏或密，體例或簡或繁，視需要而定。往往前志簡者詳之，前志備者略之，古今相承，力避重複。這一點，從全局觀察，恰是方志進入完備階段的標志之一。第四，定期修纂，幾成制度，保證了方志的連續性和完整性，即如杭州一府，明代自洪武到萬曆兩百年間，

府志修過六次，平均三十餘年編纂一本方志。迨至清代，修纂次數尤為頻繁。此等情況，在隋、唐、宋、元四朝是無先例可援的。

浙江之有通志，蓋亦始於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由浙江提學副使薛應旂主其事，費時十載。七易其稿。編成七十二卷省志。是爲我省第一部通志。“惜乎體制之未備，考訂之未詳”^③，編得比較粗糙。

雍正七年（1729），清廷爲了編纂全國性的一統志，敕各省大吏纂輯通志。並限期完成。浙江於雍正九年（1731）開局纂修，歷時五年，纂成五十四門、二百八十卷首三卷的大型通志。是志所引諸書，一一具列原文，標明出處；凡屬晚近之事，則列其有關案牘；如遇說法不一，相互牴牾之處，還附考證於下方。因此，說它紀事“信而有徵”，實非溢美之語。《〔雍正〕浙江通志》，乃我省諸通志中規模最大、體例較洽的善本，至今猶爲各界人士所重。纂定以來，版本衆多，影響深遠。除原刊本被採入《四庫全書》外，復有嘉慶刊本、光緒重刊本和民國二十三年（1934）商務印書館影印光緒本等。

明、清六百年，浙江一省的府、州、縣、鎮志乘、數量繁多，不勝枚舉。現擇較有特色者略述如下：

《〔成化〕杭州府志》，六十三卷首一卷，明陳讓、夏時正纂修。爲現存最古的一部杭州府志。是志分十八門，搜羅宏富，記述詳贍；尤以當時杭產絲織品種類及絲織業有關情況載述特詳，對研究杭州地區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很有參考價值。

《〔天啓〕吳興備志》，三十二卷，明董斯張編撰。全書編次爲二十六“徵”，分門甚細，採摭頗富；幾乎湖州一府的遺聞逸事均徵引入志，各個方面的事情亦無不備載。是志仿張鳴鳳《桂故》、《桂勝》義例，以“叙

① 《〔嘉靖〕山西通志》，楊宗氣序
② 《〔康熙〕山西通志》，條議。
③ 《〔雍正〕浙江通志》，郝玉麟序。

述典雅，掌故可稽”為要旨。每門凡涉及古書的，都載其原文，有所考證者，則附注於下。作者自稱“備志”，事實也確是求備不避叢雜。

《〔正德〕嘉興志補》，十二卷，明鄒衡編寫。是志義例異於一般志乘，寫作意圖極其明確：取宋、元諸志的材料，補《〔弘治〕嘉興府志》所未備。凡已見於弘治志者，概不採錄，故謂之“補志”。戒冗避復固屬有識之舉，但是不少地方失之疏略，則不能不說是志的一個弊病。

《〔萬曆〕紹興府志》，五十卷，明蕭良幹、張元汴纂修。是志體例頗善：全書共分十八門，每門有圖列於書後，使讀者易于循覽；書末為“序志”一卷，凡紹興區諸地志，自《越絕書》、《吳越春秋》以下，逐一考核其源流得失，這在地方志中也是一種創格。

《〔天順〕寧波府簡要志》，五卷，明黃潤玉編纂。作者鑒於舊志往往冗雜，決定刪除繁贅，別創新體，全書敘述直樸，體例簡潔，卷帙之少是歷代寧波府志所罕見者。但對“藝文”一類，僅著篇題而文皆不錄，則未免近乎簡陋了。

此外，如《〔光緒〕於菴縣志》、《〔乾隆〕烏青鎮志》、《〔咸豐〕南潯鎮志》、《〔光緒〕唐栖志》等，文簡事核，編次有序，給後人保存了不少自然科學、生產技術和經濟活動的寶貴資料，亦應列為我省方志的佳構。

辛亥革命之後到抗日戰爭開始之前僅二十多年間，除《浙江通志》外，浙江各地方志仍繼續纂修。修纂府州志者杭州、臺州兩府，纂修縣志者海寧、定海、嘉興、鄞縣、臨海、龍游、衢縣、建德，瑞安、平陽等二十九縣都曾編過新志。其中蕭山、瑞安、定海、鎮海等還修志兩次。綜觀這些新志，也顯示了若干新的特點：

第一，注意採錄有關國計民生的材料，提高方志的實用性。《〔民國〕龍游縣志》，在

海內外備受推崇。原因之一，就是纂修者比較重視方志的實用性。該志“叙例”明確提出：物價等等，與民生關係至大；而“舊日修志家侈言高尚，恒不屑道，故方志中無及之者，實大惑也”。故此志特為查出最近六十年中龍游主要商品的物價，列表備考。《〔民國〕鄞縣通志》專列“食貨志”，對工、農、林、漁、鹽業情況作了全面的記述，其詳盡程度是空前的。其他各志也都程度不等地具有此一特色。

第二，努力應用新的科技知識，提高方志的科學性。《〔民國〕嘉興新志》第一章“地理”，在“位置”欄下詳列經緯度，縣界水陸里程，在“面積”欄下詳列本縣面積、浙江各縣面積表，在“地土”欄下分列常年的溫度、氣壓、雨量、風向、濕度、臺風、梅雨等專項，廣泛地應用了天文、地理、地質、氣象、測繪、統計等當時新興學科的知識和方法。民國《衢縣志》和《鄞縣通志》不僅重視引進新興科學知識，還重視實地調查。衢縣志對舊志所記的山川、村莊全部進行了實地勘查。還用科學方法對本縣四鄉方言作了全面普查，於風俗志內特設方言一目，把方言分為名詞、動詞、代名詞、助詞、語詞、形容詞等類，每類彙集當地土語，加音訓，列考辯，基本研究方法完全相同於現代語言學。《鄞縣通志》將採訪調查、測繪考證列為修志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他們安排了採訪輿地志人員三十餘人，政教志十人，博物志四人。文獻志五十餘人，食貨志六人，工程志四人，總計百人以上，從人力方面為調查採訪提供了保證。至於志前的各種附圖，新修諸志也都改用攝影照片和測繪圖片，一改以往舊志“寫意”、“示意”的繪圖方法。

然而，由於民國時期連年動蕩不寧，內外戰爭頻頻發生，方志的修纂工作實際上處於自生自滅的可悲境地；因而修志不多，成就甚微，基本的纂修方法和條目內容仍然是承衍明清餘緒，封建糟粕、荒誕文字依舊大

量充斥於各地新纂的志書內。這一點，是我們檢閱民國方志時必須注意的。

[附記]：

本文寫作於 1984 年，近讀倉修良教授

《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 1990 年發行)第一章第一節《方志的起源》中有專門以《越絕書不是地方志》為題進行詳細考證，為筆者甚為佩服。(林正秋)

省 志

〔嘉靖〕浙江通志七十二卷 (明) 胡宗憲修，薛應旂纂。宗憲，字汝貞，號梅林。績溪人，嘉靖進士，官歷益都、餘姚知縣、浙江巡按，因平倭寇有功而加右都御史、太子太保。後因嚴嵩下獄瘐死。萬曆復官，謚襄懋。著有《籌海圖編》十三卷。應旂，字仲常，號廬山，常州武進人，嘉靖進士，官至南宮考功郎，因忤嚴嵩而貶官；後復起，官浙江提學副使，參加徐階主持纂修的《浙江通志》，未畢而去任。四年後，胡宗憲適浙，應旂已隱居金陵（今南京），宗憲派教諭袁亮等帶幣邀請，希望完工《浙江通志》撰修工作。十年間七易其稿纂成浙江建省後第一部通志。前有徐階序、應旂序、例義、浙江全圖；下分地理、建置、貢賦、祠祀、官師、人物、選舉、藝文、經武、都會、雜誌等十二志。是志記事範圍和年代，統貫古今，內容比較全面系統，能窺見一方的歷史與現狀；設置門類編目，簡明扼要，查閱方便。是志經武，較系統地記述浙江省明代以前的農民起義和邊海抗倭事迹，頗有價值，為以後修浙江通志奠定了基礎。但是志有考訂未詳、繁簡失當的缺點，清代學者王棻撰文《辨嘉靖通志誤》訂正，多有參考價值。上海圖書館藏有嘉靖刊本。（林正秋）

〔康熙〕浙江通志五十卷首一卷 (清) 趙士麟、王國安等監修，張衡、黃宗羲等纂。士麟，字麟伯，河陽人，康熙進士，由平遠推官補蓉城知縣，有政績，累遷浙江巡撫，官至吏部左侍郎。是志於康熙二十二年（1682）奉敕修撰，僅六個月而匆忙成書，次年刻印，呈於朝廷。全書分圖考、沿革、星野、疆域、城池、公署、山川、形勢、關梁、都會、水利、風俗、田賦、戶口、鹽課、物產、學校、祠祀、寺觀、陵墓等三十八門。是志和《〔嘉靖〕浙江通志》相比，門類有所增減，而內容却多沿襲。本志地圖考價值甚高，除十一府各一張外，還有重要山川圖如錢塘江、仙霞嶺、天臺山、雁蕩山；此外，海防圖頗具軍事價值。當時修志是奉朝廷之命，按秦（陝西）、豫（河南）二志篇目、格式為標準的。但浙江通志撰寫者却能因地制宜，有變化與創新，實為可貴。如豫志只列河防一門，這和陝西地高水鮮有關，而浙江為江南水分之地，江湖交叉，疏導

蓄洩之水利是民生之關鍵，故增設水利一門；又如秦志以官業昭著者，選列人物，其餘只載孝義、隱逸，而浙志又添儒林、文苑兩門，反映了清代浙江經濟、文化的發達與文化名人集中的特點。有康熙二十三年（1683）刻本。（林正秋）

〔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首三卷又名〔乾隆〕浙江通志 (清) 李衛、嵇曾筠修，沈翼機、傅王露等纂。王露，字良木，號玉筍，閩林等，浙江會稽（今紹興）人，康熙進士，官至中元（相當於門下侍郎），時為翰林院編修。翼機，字西園，號澹初，浙江海寧人，康熙進士，時為翰林侍讀學士。此外，當時著名學者厲鶚、杭世駿、陸奎勳等人亦參加編撰，雍正七年（1729），朝廷為纂修《大清一統志》而通令各省限期修纂通志（省志）同年，浙江開局編纂，前後歷時五年，於雍正十三年全書告成，次年即乾隆元年（1736）進呈朝廷。故是志有《〔雍正〕浙江通志》和《〔乾隆〕浙江通志》兩名。是志五十門，從門類看，比《〔康熙〕浙江通志》多有增加，其中海塘、蠲恤、積貯、漕運、榷稅、錢法、驛傳、祥異、封爵、經籍、碑碣、名臣、忠臣、循吏、武功、介節等十餘門為新增，把康熙志中的海防分為兵制與海防兩門；改沿革為建置，又刪帝王一門等。經此增減，舊志門類基本完備；是志內容浩博豐富又為諸省之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說：“所引諸書，皆具列原文，標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記載者，亦具列其案牘，視他志體例特善，其有見聞異詞者，則附加考證於下方。雖過求賅備，或不無繁復叢冗，然信而有徵之目，差為不為愧矣。”但是志人物一門分為十個子目，極為詳備，其字數約占全志的四分之一左右，成為是志一大欠缺。有乾隆元年（1736）刻本。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四卷 王國維撰。國維（1877~1927）原名德楨，字伯隅，號靜安，晚年又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傑出學者，辛亥革命後，王國維以清朝遺臣自居。曾為猶太富商哈同編《學術叢編》雜誌，兼任哈同所辦倉聖明智大學教授。民國八年（1919）參加《〔民國〕浙江通志》纂修工作，與張爾田共同負責掌故、雜記、仙釋等類編撰。此書是作者考訂《〔雍正〕浙江通志》舛偽殘稿四卷。卷一考訂建置沿革類，計百七十餘條；卷二至卷三考訂山川、河流計九百多條；卷

四考訂城池等十九條。這些考訂，引證史料豐富，訂誤補漏，多有價值，是修撰浙江通志的重要參考書。有民國二十九年（1940）石印《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本。

〔民國〕浙江續通志 浙江修志局修，沈曾植等纂。曾植（1850~1922），字子培，別號乙庵，晚號寐叟，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官至安徽布政使並代巡撫。自幼酷愛文史，早年研究古今法律，民國六年（1917）曾參與張勳復辟任命為“學部尚書”，失敗後閑居上海，民國十一年病故。民國三年浙江通志局成立，開始續修浙江通志，延聘曾植為總纂，學者吳慶坻、朱祖謀、王國維等十餘人為編修。是志記載，起自乾隆元年（1736）和《〔乾隆〕浙江通志》相接，迄於宣統三年（1911）約二百餘年，故稱續修，由沈起草凡例，是志除沿襲《〔乾隆〕浙江通志》體例外，新增編年體大事記、紀事本末體大事纂與遺民傳三類。不久，通志局被裁減，編纂工作停頓，至民國十三年，僅成稿本二百六十冊，民國十六年移交於浙江省立圖書館收藏。今浙江圖書館尚存稿本百七十六冊。上海圖書館又收藏文苑傳、藝術傳、選舉、職官、金石、古迹、經籍等稿本數十冊。（林正秋）

〔民國〕浙江新志三卷 姜卿雲編撰。上、中、下三篇。上篇記史地，分五章，總述全省的沿革、位置、疆域、水陸形勢、地質氣候。中篇記人文，計五章，分別總述黨政、社會、經濟、建築、文化。下篇記地方，分別記載本省七十五縣一市概況每縣（市）又分位置、沿革、疆域、形勢、城鎮、土地、戶口、黨政、司法、社團、財政、實業、教育、宗教、公益、勝迹、人物、藝文、物產和交通等二十目作扼要記載。是志特點有三：一是簡明扼要，類似今日之簡志。作者自序說：“讀者手此一編，費簡短之時間，於本省各縣已許可得其輪廓無異，得一通志縮本。”二是圖片、照片多，有各種照片近二百張。三是作者誠懇歡迎大家批評指正。書末附有一空頁《讀者對於本書之批評》和《讀者對於本書之勘誤》，並附言說：“如蒙賜教，請填此表，郵至杭州仁和路二十號姜卿雲收。除奉還郵費外，並酌致薄酬，以示謝意。”該書三卷兩冊，《浙江方志考》誤為二卷。（林正秋）

〔民國〕重修浙江通志初稿 浙江通志館修，余紹宋、孫延釗等纂。紹宋（1883~1949），字越園，晚號寒柯，浙江龍游人。早年留學日本，學習鐵道、法律，宣統元年（1909）返國任外事部主事。民國政府成立後，曾任衆議院一等秘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北京政法大學教授等職，民國十一年（1921）和1926年曾兩次任司法部次長。民國十七年辭官南歸，定居杭州，結束了宦宦生涯。民國二十三年任杭州《東南日報》副刊《金石書畫》主編。民國三十一年，浙江省設省志史料徵集委員會，余紹宋任主任。次年改名浙江通志館，又任館長，延請當時學者孫延釗、鍾毓龍等為總纂，從事徵集與編撰通志。該館於1949年三月停辦，他於同年六月病逝於杭州。他除精通書畫外，又致力於浙江方志工作，並卓有成效。民國十年他曾編纂《龍游縣志》四十二卷，梁啟超為之作序。是志引用史料達四五百種之多，史料翔實，於民國十四年刊印，受到各方好評。任館長後又為浙志獻力，撰有《重修浙江通志的體例綱要》和《略評舊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見》兩文，全面地評述《〔雍正〕浙江通志》得失並闡述重修新志的意旨；並親自撰寫《大事記》。約至民國三十七年底，民國重修浙江通志初稿基本完成，後因通志館停辦初稿移交浙江省圖書館。計有記、考、略、傳、譜五綱二十九編：即大事記、疆域考、地理考、民族考、社會考、田地考、物產考、建置考、名勝古迹考、金石考、著述考、藝術考、黨會考、議會略、司法略、行政略、財務略、計政略、糧政略、軍事略、教育文化略、水利略、交通略、實業略、宗教略、選舉譜、人物表傳、職官譜、宦績記等二十九編，編下分章，章下分節與目。有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1982年浙江圖書館將志稿復印發行。是志比較注意科學性與真實性。（林正秋）

〔民國〕續修浙江通志採訪稿 佚名輯。民國五年（1916）鉛印本。此稿擬是沈曾植纂之《〔民國〕浙江續通志初稿》的分纂稿。（林正秋）

〔民國〕浙江通志釐金門稿三卷 顧家相纂。家相，浙江紹興人。有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編入《勸堂叢書》中。此稿擬是顧氏參加民國初年沈曾植總纂的《浙江續通志》的釐金（貨物通過稅）分志稿單獨排印的。（林正秋）

杭州市

〔乾道〕臨安志十五卷 周淙纂。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乾道年間（1165～1173）曾為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知府，主纂地方志，故名《〔乾道〕臨安志》。原書十五卷，至明代已佚，今只殘存三卷。第一卷為行在所，紀皇宮、中央官署等；第二卷細分沿革、星野、風俗、州境、城社、戶口、坊市、物產、稅賦、倉場、館驛等二十餘目，記述臨安建府的由來、風俗人情、城社戶口和坊市之盛、物產之饒等；第三卷臚列了自三國以迄乾道初年的歷任臨安牧守姓氏、里貫，生平並對之在臨安的政績作了簡要介紹，這對研究南宋以前的杭州歷史頗有價值。是志敘述簡賅，詳略得宜。所載內容，常為後起的《〔淳祐〕臨安志》和《〔咸淳〕臨安志》所依據，是現存最早的一本杭州方志。清光緒間（1875～1908）學者錢保塘撰《〔乾道〕臨安志札記》，又從《〔咸淳〕臨安志》所載引文中補入是志佚文數條。宋刻原本十五卷至明萬曆年間已不存，全帙，流傳本多為三卷。今存有《四庫全書》本、光緒九年（1883）《武林掌故叢編》本和光緒二十年（1894）孫氏松壽堂影宋重刊本。（林正秋）

〔淳祐〕臨安志五十二卷 （宋）趙與憲、陳仁玉纂修。舊作施諤撰，近人考證是淳祐十年（1250）臨安府知府趙與憲纂修（見《文獻》1981年第9期《〈〔淳祐〕臨安志〉的卷數與纂修人》）。與憲，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的十世孫，淳祐年間任臨安知府達十餘年之久。他“顧念圖牒（地方志書）散落，心焉陋之，懼非所以尊宸居（都城）”故延請陳仁玉等纂修，分十二門五十二卷。仁玉，臺州人，開慶元年（1259）進士，歷官國史院編修官，權禮部郎官、浙東提刑兼知衢州。是志宋刊本早佚，至清嘉慶十四年（1810）發現殘本四冊所列山川、城門兩門六卷。城府門計三卷。分城社、官宇、學校、樓觀、園館、廂隅、軍營、坊巷等十二目，分別記述府城內外山水名勝和江湖水利等。是志體例進步，主要表現於每門前有論和條目前後的按語。序論類似一門的概述或小序，提煉與概括共性，案語大多放在條目記載之後，也有少數放在前面。其內容或是訂正前志之誤，或補充事物的沿革，或介紹不同看法與不同記載，或考證其原由等，內容價值較高。

原書二十卷，但刊本早佚，嘉慶十四年（1809）發現的宋刊本僅為五至十卷，即今流傳本。（林正秋）

〔淳祐〕臨安志輯逸八卷 （清）胡敬輯。杭州學者胡敬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淳祐〕臨安志》計分十六卷，題為《淳〔祐〕臨安志輯逸》。光緒二十四年（1898）錢塘（今杭州）藏書家丁丙家所藏鈔本，已經不全，由羅架臣重加搜集校訂，分為八卷付印，由于丙編入《武林掌故叢編》中。輯逸本僅有祠廟與宮觀二門，記載宋代杭州的寺院宮觀三四百所，並敘述其沿革與發展，是研究唐宋時期杭州宗教的重要史料。（林正秋）

〔咸淳〕臨安志百卷 （宋）潛說友纂。說友，字君高，處州縉雲（今浙江）人，淳祐辛丑（1244）進士，歷官南康軍、浙江來安撫使、兩浙轉運副使兼知臨安府（今杭州）戶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後封縉雲郡伯知平江府，元軍南下，他“以城降元”而被時人鄙視。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人殊不足道。”但他為臨安府知時所纂修的《〔咸淳〕臨安志》却為人所稱道。因是志纂修於南宋咸淳四年（1268），故名《〔咸淳〕臨安志》，原書百卷，今存九十五卷。卷首有宮城圖、京城圖、浙江圖（即錢塘江圖）和西湖圖等，為現存南宋都城的最早地圖，是研究南宋都城佈局、規劃的重要史料。前十五卷為行在所錄，記載京城皇宮、郊廟及各中央官署情況，自第十六卷以下為府志，分圖志（各縣地圖）、疆域、山川、詔令、御制、秩官、官寺、文事、武備、風土、貢賦、人物、祀祠、寺觀、園亭、塚墓、恤民、紀遺餘等二十門，記述臨安府政治、經濟、文化、民俗等各方面情況。這種體例正確地處理了立足地方與突出都城的關係，較好地體現了《都城志》的特點。是志“敘述詳贍，體例井然”，徵材宏富。辨論精覈”，為後人稱道。是研究南宋都城最豐富的原始史料，故清代著名學者朱彝尊、杭世駿等認為是“宋人志乘之最詳者”，為浙江方志中之“上駟”。原刊本已殘缺，《四庫全書》本的為九十三卷。道光十年（1830）錢塘汪氏振綺堂重刊，補為九十六卷，堪稱善本，今同治六年（1867）和光緒十七年（1891）補刊本流傳為多。（林正秋）

〔成化〕杭州府志六十三卷首一卷

(明)陳讓等修，夏時正等纂。讓，字德光，號雲軒，淮安大河衛人。天順八年(1464)進士，授寶坻縣令。成化初年為杭州知府。時正(1412~1499)，字尚一，又字季爵，號余留道人，杭州仁和人。正統十年(1445)進士，景泰六年(1455)以刑部郎中錄囚福建，多有平反，累擢南京大理寺卿。後歸，居杭州孤山西湖書院，有著述多種。是志纂於成化十年(1374)，分為封界、山川、公署、風土、學校、水利、軍政、詔赦、壇廟、名宦、科貢、人物、墳墓、寺觀、書籍、碑碣、紀遺等十八門。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述說：“所收頗冗濫，如載凌翰嘲析產小詩之類，皆非地志之體，其凡例稱引用諸書，皆簡節全文；或因而是以己意，故皆不著所出。其大略可睹矣。”明代杭州學者田汝誠也說“紀事脫略，筆力腐冗”。明代前期，杭州曾於洪武、永樂、景泰年間三次修纂杭州府志。今均已散佚，是志為現存明代杭州最早的府志。《明史·藝文志》作六十四卷。約把卷首包括在內。成化十年纂，次年刊印。今北京圖書館存原刻珍本。(林正秋)

〔萬曆〕杭州府志百卷外志一卷 (明)劉伯縉修，陳善等纂。善(1514~1589)，字思敬，號敬亭，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嘉靖二十年(1541)進士，出知歙縣，官歷山西按察使、廣東按察使，雲南布政使等。是志修於萬曆七年(1579)，前有南京工部尚書徐斌序、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政喬因阜序，並附錄南宋《〔咸淳〕臨安志》和《〔成化〕杭州府志》兩書序言。徐序說：“今天下浙(江)為諸省首，而杭(州)又為浙省首郡，東南一大都會也。”但自成化十年(1474)修志至此已有百餘年，“世代久遠，文獻失徵”，實為可惜。是志凡例較為詳盡細致，體例多有創新，如指出“郡邑各志雖體裁不同，大都以綱統目，今志則自沿革至寺觀凡三十七類，順序並列，不循他志。”如該志認為錢武肅王(錢鏐)三世五王以杭州為首府，建立吳越國有“巋然列國之重，舊志列為宦績，似乎不倫，今別為吳越世家。”推崇錢氏對杭州的貢獻。又如沿革一類，分為七卷，一至四卷分郡事紀上、中、下，列舉從夏代至元代大事較為簡略；五至七卷記明代萬曆以前大事，記載詳盡。略古詳今，處理得當。該志又一特色是每一類前有“善曰”兩字，即陳善所作“序言”。如田賦類“善曰”：“畫野分析，則壤為重因田制賦，邦計攸先，所從來尚矣。”但他最後又

說“節浮徭均賦役，以抑止無名之征，此在制祿人者，當加元意也。”指出苛捐雜稅會造成“民生凋敝，物力大絀”。現據《浙江方志考》，擬增外志一卷。有萬曆七年(1579)刊本。(林正秋)

〔康熙〕杭州府志四十卷圖一卷 (明)馬如龍修，楊鼎等纂，如龍，字見五，山東綏德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任杭州知府，二十八年升為浙江臬司。鼎，生平不詳，杭州仁和人，為杭州著名學者。該志綱目多照《〔萬曆〕杭州府志》，其內容也是上接萬曆志，分為沿革、城池、山川、古迹、宮室、風俗、物產、戶口、溝洫、田賦、恤政、學校、禮制、人物、仙釋、事紀、藝文和外志等四十門。王雲五主持《續四庫全書提要》評述說：“此志上接萬曆，蒐詩殊為詳備。蓋當時郡中名輩如通政館、邵學士遠平、顧侍郎豹文、丁郎中滋並與纂輯，故其大略體例，簡要不繁，文約而事舉，誠佳構也，叙記題詠，依類互見，而別以文之有關典故詩文之可備風謠，又無專類可歸者，另造一冊。名宦之序以爵，人物之傳以時，皆用萬曆志例，亦為得體，惟首冠巡撫金鉉序，結銜題玉百七十餘字，等於生平資歷，殊為創見。後守李鐸序，結銜稱光祿大夫知杭州。光祿大夫為清代正一品封，殊為顯要。”該志內容較為豐富詳備，近人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評述說：“雖採輯繁多，而附見其能得體，且文能與宋志頡頏。其體例能撮前志之所長，又不遺其細，使一郡之志具備。其叙賦役則按年編次，殊為遺漏；紀河渠由開而恐塞，務重於濬疏；”陳氏評述，頗有見解。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本(林正秋)

〔乾隆〕杭志三詰三誤辯一卷 (清)毛奇齡撰。奇齡(1623—1716)，原名甡，又名初晴，字大可，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1679)鴻博科進士，授翰林檢討，充《明史》編修官。素曉音律，博覽群書；著述豐富，後人編為經集、文集兩部凡二百三十四卷，時稱“西河先生”。為清代著名學者，他曾寓居杭州，喜讀方志，發現志中多誤而加以辨正，故撰本書。所謂“三詰”者，“辨前人致誤所由以詰之。一詰秦定會稽郡有海鹽、餘杭、錢唐(塘)、富春四縣，何以錢唐獨無地？二詰西部都尉治為重鎮，何以僻處靈隱山中？三詰由富春以至海寧，無不兩岸平地，緣江如綫，何以上一折甫接吳山，忽西翻靈隱；下一折不走龕、緒，忽北越臨平！”

所謂“三誤”者，“指破舊志致誤之由”。“一由劉道真《錢唐記》誤讀《漢書》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之文，不以西部都尉治爲句，而從武林山爲句；二由不考劉昭注《郡國志》已駁秦始皇由餘杭渡江之說，而仍襲其誤；三由江水東合臨浦，而劉氏誤以臨浦爲臨湖，又誤臨湖爲臨平湖。”書末又附宋之問靈隱詩、吳越王鐵幢浦兩條，不足辨者，不在所詰所辨之數焉。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印本，光緒間《武林掌故叢書》本及《西河合集》本等。（林正秋）

〔乾隆〕杭州府志百十卷首六卷

（清）鄭澧修，邵晉涵等纂，澧，儀征人，乾隆間爲杭州知府。晉涵（1743—1796），字與桐，號二雲，又號江南，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博聞強記，學識宏富，著有《孟子述義》、《爾雅正義》等。乾隆間開館修《四庫全書》，他主史部。是志始纂修於乾隆四十三年，四十九年纂成。首六卷，分宸章、巡幸，記載皇帝對杭州的巡視與有關詔令；府志百十卷分圖說、建置、疆域、城池、市鎮、橋梁、兵制、鹽法、海塘、水利、戶口、風俗、物產、選舉、人物和前志原委等三十七門。和前志相比新增海塘、水利等門。是志開卷即爲凡例而無序文和修纂者姓名，而志末又僅署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冬十二月，杭州府知府如皋王燧謹輯。這種格式較爲特殊，究其原因，《〔光緒〕杭州府志》末卷《前志本末》略有解釋說：“乾隆志創於四十四年，杭州府知府邵齊然、總修者錢塘汪君沆、會稽編修王增、餘姚邵編修晉涵；稿本略具。時（浙江）巡撫王宜望以貪黷著，知府王燧覬覦杭守，彙緣宜望，乃黜而任王；燧聘嘉定錢明經獻之，丹徒王太守文治，釐定之付梓，冒爲己輯，並不述邵之始事及助纂諸人姓名。……後（杭州）守鄭澧乃以邵稿續補修正，總修者爲邵編修晉涵，刻於四十九年十一月，而王刻板往往屏其中。鄭志出而三志廢。”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林正秋）

〔光緒〕杭州府志稿二百二十卷

（清）陳瑛修，丁丙，王棻等纂，羅槃等校訂。瑛，鬱平人，光緒甲午年（1894）爲杭州知府。丙，字嘉魚，又字松生，晚號松存（一說松亭），杭州人，自幼好學經史，收藏地方文獻，清代學者俞樾說：“家中藏書

爲吾浙冠，尤留心杭郡掌故。”他所撰《武林坊巷志》和所編《武林掌故叢書》二百餘種，是杭州地方文獻之集大成。陳瑛爲杭州知府時，丁丙將自編杭州府志稿本送上，陳瑛又請黃岩名儒王棻審改。王棻對原稿的評價是“條分體系，博引稱繁，鮮可議者。惟建置、金石、名宦、人物稍未詳核，而列女一門，則委之孫君樹禮，皆重加綴輯，頗事更張。而其餘則委仍其舊，間亦訂正而補苴之。”後因甲午戰爭爆發，日本侵略，“公私匱乏，未付梓之”。光緒二十年修，二十四年脫稿，未付梓，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十冊。（林正秋）

〔民國〕新纂杭州府志稿百七十八卷

屈映光修，陸懋勳纂。映光，民國初年浙江海寧人。懋勳，字勉濟（一作勉齋），杭州人，戊戌（1898）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民國政府後，他回浙江擔任巡按使秘書。民國五年（1916）應巡按使屈映光之邀纂撰《杭州府志》。要求“凡前缺佚者補之，光緒、宣（統）之新政宣述者續之。”懋勳僅成稿本三十三本而病歿。今上海圖書館存有原殘稿本五冊十六卷。（林正秋）

〔民國〕杭州府志百七十八卷首八卷

齊耀珊重修，吳慶坻重纂。慶坻，字子修，杭州人，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編修，官至安徽提學使。據楊復後序載：“己未（民國十八年（1929）之冬，前省長齊公（即齊耀珊）以志事體大，考訂不厭求精，吳丈靈光獨存，洞悉原委，宜復閱以垂定本。芟繁蕪、正僞奪、專校勘、齊體例，悉仍乾隆志之舊，以宣統三年（1911）爲斷。”因此齊耀珊邀聘杭州著名學者吳慶坻以“陸氏（陸懋勳）之稿芟正之。”經過吳慶坻增補修正後，是志分記、表、圖、書、略、傳六體，計四十一門。其體例格式多沿襲《〔乾隆〕杭州府志》略作增刪，如人物志，把乾隆志之循吏一目改名仕績，又增介節、疇人等目。疇人，即是記述歷史上算術家與名人，這是從舊目方伎分出，以是志爲最早，重視中國算學之傳統，實爲可貴。民國十一年刊印。《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關於修纂者署名是陳瑛修、王棻纂，屈映光續修、陸懋勳續纂，齊耀珊重修，吳慶坻重纂，是因該志是以未刊印的《〔光緒〕杭州府志稿》二百二十卷和《〔民國〕杭州府志稿》百七十八卷爲基礎增補修訂而成相關的。是志鉛印本多誤，故吳憲奎、唐詠裳

等校勘其誤，編印了《杭州府志校勘記》一冊，計十六卷，民國十五年鉛印，校訂勘誤處數以百計。有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林正秋）

〔民國〕**杭州市新志稿三十二卷** 千人俊撰。人俊，浙江海寧人，時任杭州民生中學校長。民國二十四年（1935）開始搜集資料，抗戰期間中斷，到民國三十七年大致纂成而未刻印。民國元年，杭州府城的仁和、錢塘兩縣合為杭縣，而府被取消。民國十六年，劃杭縣的城區和西湖、會堡、河墅、泉塘、江干六區新置杭州市，此為杭州市之始。是志稿以辛亥革命為始，止於民國三十五（1946）年。（林正秋）

〔萬曆〕**錢塘縣志十紀**（明）聶心湯修，虞淳熙纂。心湯，新淦（今江西清江）人。萬曆間任錢塘（今杭州）知縣。淳熙，字長儒，號德園，錢塘人，萬曆十一年（1583），授兵部主事，官至吏部稽勳司郎中，後因病歸故里，以著詩文為樂，著有《孝經集靈》等。是志修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記事止於三十七年。全志分為十記四十九目，約二十萬字。正文之前繪有錢塘縣疆圖、錢塘縣治圖。此為錢塘現存最早的一部縣志，是志雖取郡志、西湖志損益而成，但由於纂修者能撮其大旨以刪繁，間遺訓咨故事以補略，注重濬水溉田致菱菱穀米水泉之用，故頗具價值，而且纂修者以“古者經見而今者未傳”，明確提出“詳今略古”的觀點，不失為很有見地。是志乃聶聘虞等人為纂。《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未著錄虞為纂人，說法不够完整。有萬曆三十七年（1609）刊本，光緒十九年（1893）錢塘丁氏刊本，後編入《武林掌故叢編》第十六集中。（陳光熙）

〔康熙〕**錢塘縣志三十六卷首一卷**（清）魏嶮修，裘璉等纂。嶮，字陟安，直隸南樂（今河北南樂）人（《浙江方志考》誤為南康人），進士，康熙五十四年（1715）授錢塘知縣。璉，字殷玉，浙江慈溪人，進士，選庶吉士，與修《大清一統志》，著有《復古堂集》、《橫山文集》、《玉湖詩綜》、《玉湖樓傳奇》等。是志修於康熙五十七年，同年刊本，分五十一目。文簡事賅，記載內容頗為豐富。但體例安排尚有欠妥之處，如卷十六名宦、卷十八大臣、卷十九名臣、分列既難，設置似嫌重複。

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刻本。（陳光熙）

〔嘉慶〕**錢塘縣志補**（清）吳允嘉纂。允嘉，字志上，仁和（今杭州）人，著有《碧溪詩話》、《吳越順存集》、《浮梁陶政志》等。此書不分卷，補載皆《〔康熙〕錢塘縣志》（魏志）所未備者。僅有抄本一部六冊，原為錢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本，今存南京圖書館。（陳光熙）

〔嘉靖〕**仁和縣志十四卷**（明）沈朝宣纂修。朝宣，字君力，號三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誤謂：朝宣，字三吾），仁和人，歷官涿州（今河北涿縣）教諭、江陵（今湖北江陵）知縣。是志修成於嘉靖二十八年（1549），未刊行，為仁和縣首志。作者詳稽府志，旁採雜書，遍歷坊隅，博訪故老，義例悉仿洪武府志。記事自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因錢江縣改立仁和縣始，至明嘉靖年間止，共五百餘年間事。正文分封畛、橋梁、山川、公署、風土、學校、水利、恤政、壇廟、名宦、科貢、人物、墳墓、寺觀、書籍、碑碣、記遺共十七門八十六目。其中水利門載城內水利、六井、城外水利、修築海塘要略、潮候、陡門閘筧堰，這對研究杭州古代水利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地理類存目中評價為：“體例頗謹嚴，較他地志之冗濫，差為勝之”。有清鈔本、《武林掌故叢編》本、臺灣《中國地方志叢書》本。（陳光熙）

〔康熙〕**仁和縣志二十八卷**（清）趙世安修，顧豹文、邵遠平纂。世安，字惟康，遼陽（今遼寧遼陽）人，監生，康熙二十一年（1682）任仁和縣知縣，《八旗通志》稱其“強毅多幹略”。豹文，字季蔚，號且庵，錢塘人，進士，歷官知縣、監察御史，著有《三楚奏議》、《六書古韻》、《世美堂集》等。遠平，字戒三，進士，歷官宏文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詹事府少詹事，著有《史學辨誤》、《戒三文存》、《河工見聞錄》等。是志修於康熙二十五年，次年刊本。是志分四十五目，約三十萬字。正文前載序三篇及縣志例，目錄後有縣城圖、下塘圖、中塘圖、上塘圖四幅。是志主要內容遠採《武林舊事》、《癸辛雜志》、《武林舊事補》，近採《〔成化〕杭州府志》、《〔嘉靖〕仁和縣志》、《〔萬曆〕杭州府志》及田汝成《西湖志》，其中人物增萬曆以來十之二。但門目之歸屬似欠周詳，如

山川門僅列城外山、城外河，而將城內山、城內河列入封畛門中。是志各門目前均有“趙世安曰”一段有叙有議的文字，內容大多空泛。據顧豹文序，顧僅從事志書校讎，並未參加編纂。有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陳光熙）

〔光緒〕仁和縣志稿（清）蕭治輝、孫峻纂。峻，字極于，號康候，貢生，杭縣（今杭州）人，精目錄之學，尤熟杭郡掌故，與丁丙同編《武林掌故叢編》，清末掌管文瀾閣《四庫全書》，與餘杭孫樹禮合纂《文瀾閣志》。仁和縣志自康熙趙志後，二百餘年失修，光緒二十九年（1903）知縣蕭治輝聘孫峻主纂，積稿二千四百餘頁，後蕭治輝調任鄞縣，未刊行。後因孫氏壽松堂失火，文稿大部焚毀。現浙江圖書館殘稿本僅封畛、縣令兩門，約四萬字。（陳光熙）

〔乾隆〕唐棲志略稿二卷 又名唐棲志略（清）何琪纂。琪，字東甫，錢塘（今杭州）人，著有《小山居稿》。此書取周逸民《棲乘類編》刪改而成。而《棲乘類編》又以里中耆宿張豐庵《棲里景物略》、曹菽園《棲水文乘》二書分類增補而成。全書正文分山水、古迹、梵刹、園圃、寓公、風俗共六目。書成於乾隆己丑（1769）。該書是浙江鄉鎮志中堪稱簡致潔洵的一部。唐棲鎮清代在仁和縣北五十里，大運河兩岸，今屬餘杭縣。有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光緒七年（1881）《武林掌故叢編》第二集本。

〔光緒〕唐棲志二十卷（清）王同纂。王同，仁和人，官至刑部主事，曾參與《臨平記補遺》蒐輯和《〔光緒〕杭州府志》分纂。是志於光緒十五年（1889）編纂。全志分圖說、山水、橋梁、街巷、遺迹、祠廟、梵刹、人物、藝文、碑碣、塚墓、事記、詩記、雜記共十四門。其時，唐棲為杭州附郭之大鎮，為產蔬果著名之地。有光緒十六年（1890）錢塘丁氏刊本八冊。（陳光熙）

〔萬曆〕餘杭縣志十卷（明）戴日強纂修。日強，字兆臺，安徽蒙城人，舉人，萬曆三十八年（1610）任餘杭知縣，以強治有能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全志）分十門，子目六十有二。中

間記載多舛誤，如沿革門云：漢高帝時屬荆吳國。不知漢時餘杭為西部都尉治，仍屬會稽郡。城墉門云：故城在今縣溪南，莫詳所始。不知《〔咸淳〕臨安志》載漢熹平二年（173）所改，經兩次遷徙，至後唐時號為清平軍。殊為疏於考訂。至第一卷既立山川一門，而又別立徑山志；既有古迹一門，又別立洞霄志，更為冗復矣”。但作為餘杭現存最早的一部志書，仍有相當的價值。有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刊本。（陳光熙）

〔康熙四年〕餘杭縣志十卷（清）宋士吉纂修。士吉，號浣亭，江西奉新人，拔貢，順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七年（1668）任餘杭知縣。是志康熙四年修。宋士吉序云：“自甲辰初以迄乙巳夏杪，詳繹舊聞，博採新迹，旁求於儒雅之彥，就正於有道之門，粗竟有緒，釐為十卷”。所記內容堪稱詳實。有康熙四年（1665）刻本。（陳光熙）

〔康熙十二年〕餘杭縣志八卷（清）張思齊纂修。思齊，遼陽人，康熙七年（1668）任餘杭知縣，在任六年，為政不煩，盡心水利。是志修於康熙十二年（1673），同年刊本。（陳光熙）

〔康熙〕餘杭縣新志八卷（清）龔嶸纂修。嶸，字岱生，福建閩縣（今福建閩侯）人，貢生，康熙十九年（1680）任餘杭知縣，性行慷慨能任事。是志康熙二十二年修，二十四年（1685）刊本。（陳光熙）

〔嘉慶〕餘杭縣志四十卷（清）張吉安修，朱文藻纂，崔應榴、董作棟續纂。吉安，字迪民，江蘇吳縣人，舉人，餘杭知縣。文藻，字映溈，號朗齋，仁和人（今杭州），精六書、金石學、史學，著有《碧溪草堂集》。應榴，號秋谷，浙江海鹽人，著《吾亦廬稿》。作棟，字工求，號書巢，餘杭人，進士，曾任河南魯山知縣。是志修於嘉慶十年（1805），十三年付梓。卷一為考，計圖十九幅，正文分四十四門。其中記水利特詳，凡例稱：“凡堤防之築，捍禦之方，今昔殊形，必悉備而書之。勤恤民隱而除其害，當有取於斯”。有嘉慶十三年（1808）刻本。光緒六年（1880）重刊本和民國八年（1919）鉛印本。（陳光熙）

〔光緒〕餘杭縣志稿 (清) 褚成博纂。成博，餘杭人，光緒進士。是志稿不分卷，亦無序跋及凡例、目錄。志稿前一部分為補《〔嘉慶〕餘杭縣志》之遺漏，內容涉及鄉里、市鎮、山水、水利、兵制、恤政、職官、選舉、循吏、列傳、方外、列女、碑碣、祥異、物產等，增補各條均注明材料出處。後一部分為續《〔嘉慶〕餘杭縣志》，設衙署、學校、水利、田賦(附保甲團練章程)、戶口、倉廩、兵制、鹽法、恤政、祠廟、職官表、名宦、選舉、人物列傳、藝文、祥異、方外、列女諸門。水利記事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六月止。有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褚成博之兄褚成亮另編有《餘杭縣志補遺》(傳鈔本)，所補凡數十百條。(陳光熙)

〔崇禎〕臨平記四卷 (明) 沈謙纂。謙，字去矜，號東江，仁和人，著有《東江集鈔》九卷，別集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別集類存目云：“崇禎末，杭州有西陵十子之稱，謙其一也。所著文集數十卷，晚年手自刪汰，僅存詩文八卷，雜記一卷，名曰集鈔。末附填詞南北曲為別集一卷，大半皆香奩之作”。沈謙自叙《臨平記》經始於崇禎癸未(1643)三月，告成於甲申(1644)十二月。是書紀事自漢至元，為事記二卷、附記一卷、詩一卷。卷之首有臨平圖一幅，卷之尾附臨平三十詠。臨平，北宋時即為仁和縣四鎮之一。全書分年紀事，係鄉鎮志中之創新。有順治五年(1648)刊本，另有《武林掌故叢編》第十集本。(陳光熙)

〔光緒〕臨平記四卷附錄一卷補遺四卷續補遺一卷 (明) 沈謙纂，(清) 張大昌補遺。光緒十年(1884)，仁和縣舉人張大昌仿照沈謙《臨平記》體例，編輯東晉至明末有關臨平鎮文獻資料成《臨平記補遺》四卷、續補遺一卷。次年即刊入《武林掌故叢編》第十集。曲園居士俞樾在序言中稱《臨平記補遺》實於《臨平記》有探討也。(陳光熙)

〔光緒〕臨平記再續三卷 (清) 陳棠、姚景瀛纂。棠，字蔭軒。景瀛，字虞琴。均為臨平人。是書係稿本未刊行。《臨平記》記臨平一鎮事，繼明沈謙所纂後，有仁和潘夏珠撰《臨平續記》(見民國杭州府志卷八十七著錄，未見傳本)及張大昌編

《臨平記補遺》記事至明末。為補續前記，陳棠竭其心力積稿盈尺，未及編次而疾作，囑姚景瀛續成，記人物至清末。《臨平記》為三卷，《臨平記再續》三卷，總計六卷，《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為《臨平記再續六卷》，有誤。稿本存於浙江省圖書館。(陳光熙)

〔正統〕重修富春志六卷 (明) 聶大年原修，吳堂纂修。堂，字思化，江西樂平人，進士，富陽知縣，在任興學校、營譙樓、奏減縣貢、聘修縣志、築春江堤以捍患，官至和州(今安徽歷陽)知州。是志正統五年(1440)知縣聶大年原修，正德間，堂因舊志殘缺，始為重纂，正德十六年(1521)刊本。全志分邑治、封域、衙門、建置、山川、橋道、戶賦、物產、壇祠、院觀、祀典、寺觀、古塚、官師、題名、歷代人物共十六門，志首載富春侯顏祖像、子陵嚴先生像，有吳堂題寫的像贊。富陽縣在秦時為會稽郡富春縣，是志從其古名。《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作“七卷”，現從陳讓貽《稀見地方志提要》改作“六卷”。有正德十六年(1521)刊本。(陳光熙)

〔康熙十二年〕富陽縣志十二卷 (清) 牛奂纂修。奂，字潛之，山西長治人，貢生，康熙九年(1670)任富陽知縣，多惠政，善屬文。是志康熙十二年修，同年(1673)刊本。內容沿襲正德舊志(即正統重修富春志正德刊本)續輯而成。(陳光熙)

〔康熙二十二年〕富陽縣志十卷 (清) 錢晉錫纂修。晉錫，字方未，江蘇太倉人，拔貢，康熙二十年(1681)任富陽知縣。是志康熙二十二年修，同年刊本。內容多因前志(牛志)之舊而重為編纂。全志分三十五門，首載圖考：縣境全圖、縣城圖、儒學圖、縣治圖、湖浦堰壩圖、八景圖，正文分建置、沿革、星野、祥異、疆域、形勢、廣袤、里到、城壕、市鎮、坊巷、鄉保、聖宮、職署、倉庫、驛郵、演武場、養濟院、漏澤園、名勝、古迹、祠宇、寺觀、風俗、節序、物產、土貢、水利、賦役、學校、官守、選舉、人物、藝文。有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陳光熙)

〔同治〕富陽志備採三十二卷 (清) 佚名纂。是書約作於光緒間，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卷二十九藝文記事至同治十三年(1874)止。(陳光熙)

〔光緒〕富陽縣志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 汪文炳等修，蔣敬時、何鎔等纂。文炳，字半樵，廣東香山人，進士，富陽知縣。敬時，字耐谿，富陽人，舉人，曾任浙江常山縣教諭。是志光緒二十五年(1899)創修，三十一年刊成，(據《浙江方志考》)，約五十萬字。全志以圖、表、志三者為綱，圖、表、志之前皆撰小引，凡圖之後有說，凡表之後有記，凡志之篇末各係以論。是志充分發揮了圖表作用。圖有七種：縣境總圖、縣境分圖(以上為計里開方圖)、縣城圖、縣治、邑廟圖、學宮圖、書院圖。表有八種：①富陽縣沿革表；②城鄉六區莊園坊巷市鎮村落表；③富陽職官表；④列代選舉表；⑤列代仕進表；⑥咸同間紳民殉難表；⑦咸同間婦女殉難表；⑧歷朝貞烈節孝婦女題名表。由於修纂者對各地多種志書能參互考訂，故體例較有條理。修纂者提出“一時有一時之法，一地有一地之宜，以期不悖於古，無戾於今”，“凡無與掌故及民生利病者概屏勿錄”。這是值得重視的見解。有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據《浙江方志考》)。(陳光熙)

〔光緒〕富陽縣輿地小志 (清) 陳承澍修，徐澹仙纂。承澍，青浦(今上海青浦)人，貢生，曾任富陽知縣，與修《〔光緒〕富陽縣志》。是志正文為“富陽縣輿圖並水陸道里記莊分路程歌”。其中圖有富陽縣八里方總圖、富陽縣城圖、富陽縣四里方分圖(共六幅)，圖後依次載富陽縣沿革、富陽縣水路道里記(記徑流富春江一條，支流十三條)、富陽縣陸路道里記(記幹路、枝路、分路共十三條)、富陽縣莊分歌(計六區七十五莊)、富陽縣路程歌及總歌。從陳承澍的序中可以大略了解修輯是志的目的和過程。陳序云：“訂邑志以續汪前縣未竟之功。徐君澹仙慨然以輿地自任，親歷山鄉，悉心測繪，寒暑不輟，有志竟成。閱兩年而以稿見示”。陳序又云：“顧圖記備一縣之掌故，貴乎精核；歌訣供一方之傳誦，故取其淺顯。其用既異，其體也殊，爰將圖記載入志乘外，另與莊分路程歌合訂成冊，助資石印，俾薦紳士庶父老兒童皆得識本土之形勝，道前代之異聞”。有光緒三十二年(1906)

石印本。(據《浙江方志考》)(陳光熙)

〔光緒〕富陽縣新舊志校記二卷 (清) 朱壽保纂。壽保，富陽人，曾任永嘉教諭。校記分上、下卷，有朱壽保自序及跋。朱在序中對《〔光緒〕富陽縣志》(汪志)“辭甚非薄舊志，並歷詆前哲名篇，盛自誇飾”甚表不滿，認為汪志“雖於佚文、遺獻、國故、民宜，採摭備，乃於舊志之疏誤者勘所考證，而前後之矛盾、是非之刺謬者什之三四焉，至若棘句鉤章、魯魚亥豕尤指不勝屈”。因而校記主要針對汪志體例之參歧、文字之訛脫，也兼及康熙牛兔、錢晉錫兩志之疏誤。其六區十鄉七十五莊考，確較光緒汪志為詳；卷下人物條在評述“舊志人物別類分門品題雖未允當而古法猶存”的同時，指出光緒汪志“濫收雜列”的弊病。此校記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有次年(1907)溫州翰墨林石印本。(陳光熙)

〔宣統〕富陽縣新志補正二卷 (清) 朱壽保纂。是書著成於宣統三年(1911)七月。朱壽保序云：“予昔著《富陽縣新舊志校記》二卷，糾謬訂訛，冀彌其闕。迨後加校讎，知尚未盡於此者”，“因旁稽歷史，並考今之制，續為補正二卷”。補正內容涉及沿革、疆域、區莊、選舉、人物、列女、學宮、兵制等共二十七個門目。有宣統三年(1911)溫州翰墨林石印本。(陳光熙)

〔康熙〕臨安縣志十卷 (清) 陸文煥纂修。文煥，字廷元，江蘇常熟人，貢生，康熙十三年(1672)任臨安知縣。從是志張顧恒序“前縣令臣陸文煥仍厥舊章，接以昭代，旁搜博採，編授剗”可知體例多循舊志。全志分輿地志、建置志、官師志、人物志、選舉志、田賦志、保恤志、風土志、雜記志、藝文志共十志四十六目。正文前列縣境圖、縣治圖、天目山圖、玲瓏山圖等，繪製精美。是志是現存最古的臨安縣志。有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及康熙二十二年(1683)增修本。(陳光熙)

〔乾隆〕臨安縣志四卷 (清) 趙民洽修，許琳纂。民洽，絳州(今山西新絳)人，乾隆十七年(1752)以舉人知臨安。琳，字介臣，臨安人，貢生。是志修於乾隆二十四年，當年修成，分五十七

目。卷一載序、恩典、凡例、目次、圖說。正文各目均有引言，有的目在敘事結束後還有議論。是志係依前志體例按類編次，記載較為詳贍，“聊備統志之取裁”，但內容上也難免繁蕪重復，編目頗有未當。又有光緒十一年（1885）活字重印本十冊。（陳光熙）

〔宣統〕臨安縣志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彭循堯修，董運昌、周鼎纂。循堯，湖南長沙人，臨安知縣。運昌，湖南桃源人，貢生。鼎，周家坪（今陝西南鄭）人，貢生。是志宣統二年（1910）修，有當年木活字印本。卷首載序、凡例、纂修姓氏、恩典、輿圖（並圖說）。末一卷載志原、舊校纂姓氏、補遺、捐資姓氏、正誤。正文分爲八志：輿地志、食貨志、學校志、禮儀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共列七十四目。卷首輿圖計有：合境山川之圖、初選投票區域圖、縣治圖、學宮圖、便民倉圖、洞霄宮圖、天目山圖、徑山圖、大滌山圖、玲瓏山圖、華石山圖和臨安十景圖共二十二幅。較《〔乾隆〕臨安縣志》趙志圖說增初選投票區域圖及便民倉圖二幅。乾隆趙志將詩文附載山川古迹中，是志仍因康熙陸志之舊將詩文載入藝文。末一卷彙舊序爲志原，其實即彙集光緒十一年（1885）重印乾隆趙志本時的全部序言而成。有宣統二年（1910）木活字印本。（陳光熙）

〔康熙〕於潛縣志八卷

（清）趙之珩修，章國佐、何爾彬纂。之珩，字楚璧，河南遂平人，進士，康熙九年（1670）任於潛知縣，多善政。爾彬，字春曹，和章國佐同爲於潛人。全志分輿地志、建置志、財賦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誌共八志五十二目，各志均列有總記。財賦志搜羅較繁，記及瑣細，而山川、水利記地水多，殊爲疏缺。是志有康熙十二年（1673）刊本，又有乾隆三十一年（1766）知縣陳泰年重印本。（陳光熙）

〔嘉慶〕於潛縣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蔣光弼修，張燮、李江纂。光弼，號鏡吾，江蘇常熟人，舉人，曾任《四庫全書》館分校、於潛知縣。燮，號曙村，浙江鄞縣人，於潛縣學訓導。江，號耕香，浙江武康人，舉人，於潛縣學教諭。嘉慶十五年（1810），五月，前知於潛縣事蔣光弼序云：

“真贋必加嚴辨，彼此更定是非，究例尋文，分門別彙，言無一端可盡，事必擇善而登，訂定一年始克告成。”據此，是志實創修於嘉慶十五年前。《浙江方志考》云“嘉慶十五年創修，十七年告成”不確。全志正文爲疆域志、創建志、學校志、山川志、名勝志、祠墓志、寺觀志、水利志、風俗志、食貨志、田賦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事異志。志首各有小序。首一卷載目錄、御製耕織圖序、御製耕織圖詩、耕織圖四十六幅（何太青繪）、宋於潛令樓璠耕織圖詩及縣境圖說、縣治圖說、學宮圖說、天目山圖說、桃源書院圖說。末一卷載前志原序。是志名宦傳云：樓璠（1090～1162），字壽玉，一字國器，浙江鄞縣人，宋高宗紹興年間爲於潛令，篤意民事，念田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爲耕織二圖，係以五言詩，未幾朝廷遣使循行郡縣，以課最聞，尋因薦入召對，進呈御覽，即蒙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於屏間。是志成稿於嘉慶十五年（1810），十七年（1812）木活字印本。（陳光熙）

〔光緒〕重修於潛縣志二十卷首一卷

（清）程兼善纂，謝青翰增輯。兼善，浙江嘉善人，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編纂是志，至民國二年（1913）謝青翰略增新纂後付印。程兼善撰寫的重修於潛縣志凡例云：“前志修於嘉慶十七年（1812），距今已八十餘載，道光季年會續修一次，並未重刊，祇將舊本增入數頁，遺漏甚多。此次重修，即以此本爲底稿，惟自咸豐至同治初年，地更兵燹，文獻無徵，新增實少”。是志經謝青翰略增新纂後，計爲卷二十，爲目八十有四。分別爲疆域志、創建志、學校志、山川志、名勝志、祠墓志、寺觀志、水利志、風俗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上、中、下）、藝文志（上、中、下）、食貨志、田賦志、事異志。程兼善自云是志未能繁簡得中。於潛縣於1958年併入昌化縣，後二年昌化縣又併入臨安縣。（陳光熙）

〔康熙十二年〕昌化縣志十卷

（清）周頌孫修，陳秉謙等纂。頌孫，襄陽人，康熙十年（1671）任昌化知縣。秉謙，昌化人，進士。是志康熙十二年（1673）修，刊本。據著錄可查，昌化縣志自宋至明共修輯成七種現均不見傳本。是志爲昌化現存最早的一部縣志。周頌孫序云：“是舉繼古續今，纂彙事實，焉能竊附諸賢之末，第昔之訛者正